



军史人物

亮相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解放战争后期，一位参加剿匪斗争的解放军传奇英雄李延培，舍生忘死、上山劝降成功，演绎了一段动人心魄的难忘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事迹一点也不比人们熟知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潜入匪巢配合战友剿灭“座山雕”的故事逊色。

抗战时期，日伪特务机关采取拉拢欺骗等手段，将居住在山林中的部分鄂伦春人改编为“栖林大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他们又被国民党收编为东北挺进军混成第6旅骑兵第20团。其中莫金生、莫东生兄弟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与土匪头目磕头拜把子，结为兄弟，结成反动联盟，长期与人民政府为敌，在北安一带流窜骚扰破坏。1945年底，共打死打伤我军官兵400多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0多名。1946年6月12日，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王肃等同志也遇害身亡。

为保证东北地区的发展和建设工作，进深山、剿残匪、保平安就成为当时我党我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考量，中共中央和中共东北局1948年12月作出指示：鄂伦春族土匪首领莫金生问题是特殊的民族问题，应与国民党组织的政治土匪、惯匪、顽匪等匪徒区别对待，要采取政治宣传教育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方针。根据这一指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事部立即调整方案，将硬打硬拼方案改为“围困、攻心、促降”的战略战术，并召开会议，研究派代表上山谈判，争取以战促和、通过劝降和平解决匪患，保证鄂伦春民族的延续和发展。

然而，之前的劝降尝试进行得很不顺利，曾有十几批前去谈判的干部战士被杀害。再次派人上山深入匪穴，可谓九死一生，要求谈判代表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不畏牺牲的精神。

“让我去吧！”关键时刻，一个人站了出来。他个子不是很高，面庞清瘦、颧骨高耸、眉毛厚重、干练严肃，身上透着一股威武气质，他就是省军事部警卫团政委李延培。

李延培，1918年生，陕北清涧人。1935年3月，他参加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立的红26军，参加过“东征”“西征”和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等。

长征

第4684期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70年前的天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关键性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总攻于1949年1月14日10时发起，至1月15日15时结束，历时29个小时，创造了我军在最短时间攻克敌重兵集团固守设防大城市的先例，成为人民解放军城市攻坚战的经典之作。

天津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军的攻坚战是重要的，但地下党的紧密配合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在1959年1月天津解放十周年之际，他曾指出：“应



天津地下党获取的敌城防图。资料照片

李延培：堪比杨子荣的剿匪传奇英雄

■褚银谢浩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延培在隶属八路军第115师的部队参加过平型关大捷，后调任新四军第3师第10旅第29团第2营营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党指派先期进军东北的优秀干部中的一员，到达黑龙江北安地区开展扩军建政工作。他参加过义县、清河门、莺欢池等战斗，转战四平、长春、葫芦岛、沈阳等地，先后任第四野战军第2纵队第5师独立团团副、黑龙江省军事部军事科长、警卫团政委。由于李延培作战英勇，冲锋在前，加之又是陕北人，因而得了个“李闯王”的绰号。在肃清国民党先遣军与日伪汉奸、土匪勾结的反动武装的战斗中，李延培驰骋疆场，一往无前，战功显赫。仅1946年，他和战友共进行剿匪战斗321次，毙伤土匪4000多名，缴获枪支8000多支，使得1947年初就基本肃清了省内的匪患。但剩余的这股鄂伦春族土匪有很强的民族特殊性，更加剽悍、危险、凶狠，劝降能成功吗？

面对大家的担忧，李延培豪迈地说：“我经验丰富，而且现在大势已定，我给他们讲明利害，指出光明之路，争取成功。”看到李延培信心满满、意志坚定，上级同意了李延培的请求，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并叮嘱他力争完成任务，平安凯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9年1月13日，李延培带着参谋穆景祥出发了。这时，东北还是最寒冷的时节，寒风凛冽、大雪过膝。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一个叫邵把头木营的地方找到了莫氏兄弟的山寨。当他们刚缓下一口气，就听一声大喝：“干啥的？”一排黑洞洞的枪口便对准了他们，一场生死考验摆在面前。

面对众匪，李延培冷静地说：“我是解放军谈判代表，我们没带武器，要见莫金生谈话。”土匪们不由分说，把他和穆参谋绑了起来。

当莫金生看到站在面前穿着解放军军装的李延培时，脸一沉，随即下令：“拉出去枪毙！”几个土匪拥上来，李延培没有慌乱，厉声喊道：“慢着！”他凛然地说：“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等我把话说完再杀也不晚！”

莫金生的兄弟莫东生急忙上前劝道：“让他把话说完。”莫金生只是用目光看着李延培。

接着，李延培从国际形势到全国解放，从国民党垮台到党的民族政策……有理有据、滔滔不绝。莫金生默默地听着，对他的胆略和口才暗暗敬佩。

李延培最后说：“我们之所以没有进兵打你们，是为了挽救你们，知道你们是被骗上当，才误入歧途。为了你们及家属的生命安全，还是派人上山谈判为好。”他盯着莫金生和莫东生兄弟：“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留下来作人质，谈判的人七天不回来就可以毙掉我。”这时，混入鄂伦春部落的国民党挺进军顽匪张国芳和曾桂山等急忙对莫金

生说：“别听他的赤化宣传，杀了他！”

话音刚落，莫金生的兄弟莫东生、侄子莫德林和他们的长辈莫福全、莫福宝异口同声说：“不能杀！不能杀！都到什么时候了！”有的人还指着张国芳和曾桂山的鼻子说：“不许你们再说话了！”莫金生只是沉默不语，内心却在激烈地斗争着。看到这种情形，他的侄子莫德林站起来说：“这样，我先下山看看，回来再说。”

也许是被李延培的讲演触动，也许是莫家族人的态度起了作用，莫氏兄弟最终决定，把随同李延培一起来的参谋穆景祥留下来当人质，由莫德林跟着李延培下山谈判。峰回路转、曙光初现，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终于解除了，和平解决迎来了巨大转机。

当又黑又瘦、衣衫褴褛的李延培和莫德林一起回到省政府所在地北安时，引起了轰动。战友们看到“李闯王”不但平安回来，而且带回了山上的谈判者，大家又惊讶又高兴，都称他是单刀赴会的“孤胆英雄”。

在北安，莫德林受到了热情接待，领导亲自接见，李延培全程陪同。我方领导一再向他交代党的政策：只要下山，不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可以不缴枪支，继续在山上打猎，政府还帮助选点定居。莫德林听了非常高兴，再三表示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不再与解放军对抗，并动员其他人员尽早下山。莫德林最后说：“就是别人不下山，我自己也要下山”。在北安住了两天后，莫德林带着几匹马粮食、衣物和药品等救济物资返回了。

回到山寨，莫德林把北安之行和解放军的诚意向莫金生、莫东生等人作了报告，并说：“再这样下去，不但保护不了老婆孩子，自己也得白白送死。国民党已经垮台了，我们不能再打下去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多数人都同意再次谈判，条件满意就投降。莫金生的几个叔父也说，哪有老百姓跟国家闹的，这几年跟你们胡干，你弟弟他们白白送死了。谁愿意干就自己去吧！”

看到人心所向，莫金生只好同意派莫德林再次去谈判。于是，莫德林带上警卫莫德生、汉族秘书宋宝勤，以及留作人质的穆景祥一起下山了。

第二次谈判，气氛更加融洽，但莫德林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大家很是意外。原来，莫德林要求李延培为干爹。因为在鄂伦春族内，朋友之间磕头拜把子和认干亲很盛行，他们以此建立感情，增加信任，避免背叛伤害。莫德林认为，一旦李延培成了自己的干爹，父子之亲可以保证他们以后平安无忧。

性格豪爽、做事果决的李延培理解莫德林的疑虑，从团结民族兄弟、促成和平解决的角度出发，他痛快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解放军和鄂伦春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认亲仪式完成，李延培受上级指派，向他的“干儿子”宣布了党的政策：第一，投降后不能再抢，吃喝穿用一切东西由政府供应并派车送到；第二，如果鄂伦春人愿意在山上打猎也可以，什么时候愿意下山自愿；第三，鄂伦春队伍中的那些汉族人，以及部分日本和其他顽匪都要送下山来，全部交给政府处理，一个不漏；第四，不准放火烧山，要保护森林不受损失。莫德林表示一定会向山上转达，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但李延培总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顺利。

果不其然，莫德林回去把这四条一公布，虽然大多数鄂伦春人拥护下山投降，但上百名汉族土匪等对第三项条件提出了反对，他们害怕下山后受到人民政府严惩。

莫金生、莫东生兄弟也不愿意把其中十几个和自己磕过头、拜过把子的汉人交出去，认为那样不够义气。

匪连长曾月文，还有个姓黄的营长害怕自己被送下山，就召集心腹秘密开会，决定发动“兵变”，把莫氏兄弟和莫德林全部干掉，掌握队伍。没想到，一个参会的汉族人悄悄把这件事报告了莫金生。

第二天一大早，莫金生、莫东生、莫德林命令全体人员集合，从队伍中把密谋起事的十多个汉人和鄂伦春人全部拉出来绑上，并下令枪毙了其中大部分人。

这一下，整个队伍再没人敢乱说乱动了。经过一番商讨，大家全部同意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9年2月2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莫家一行人走下大山来到北安，莫金生作为代表正式签字，李延培作为最大功臣也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为了做好感化工作，当地人民政府抽调人员组成了民族政策工作队，给山上的鄂伦春人送去粮食、布匹和药品等物资，使他们真正认识党的民族政策。

李延培还和“干儿子”莫德林再次上山，说服了莫金生让他的妻子也下山参观。莫金生妻子下山之后，军事部部长于天放亲自接待她，反复宣讲党的民族政策，人民政府还派人领着她到处参观，并给她拍了不少照片。回去后，莫金生的妻子天天念叨共产党如何如何好，解放军如何如何好，时间一长，莫金生终于彻底转了弯。

1951年，黑龙江省政府指示黑河鄂伦春协领公署成立护林大队。协领公署任命莫东生为护林大队队长，莫金生为副大队长。协领公署还几次邀莫金生到各地参观，他先后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城市游览，思想有了较大转变。

经过协领公署反复做工作，1952年8月份，在莫金生支持配合下，张国芳、曾桂山等最后4个负隅顽抗的汉人土匪



剿匪传奇英雄李延培。

资料照片

全部被带下了山。

1952年12月，黑龙江省组织了一次全国参观团，莫东生、莫金生等又赴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参观，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北京，莫氏兄弟迎来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这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观团并和全体团员合影留念。

毛主席走了过来，关切地问：“你们中间是不是有鄂伦春族啊？”莫东生激动地答道：“有。”毛主席亲切地和他握手，问：“你是莫东生？”莫东生回答说：“是。”毛主席又关切地问：“鄂伦春人都下山了吗？”“都下山了。”莫东生使劲点头。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使莫氏兄弟十分激动、进步明显。从1954年开始，莫东生调到黑河地区任署民委副主任，莫东生任逊克县林业股股长；莫德林被任命为黑河地区林业科科长；其他人也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后来，莫金生又被选为省政协委员，莫东生担任省民委委员，参与协商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真正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权利。莫氏兄弟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护林防火、发展生产和建设鄂伦春新村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时光飞逝，转眼70年过去了，下山定居的鄂伦春族人口从不足2000人增长到如今的近9000人，从没有语言文字到念书上大学，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现在，黑河鄂伦春族乡正改造民族小学，筹建卫生院，还建起了鄂伦春新居、原始部落景区、漂流码头等等，要打造鄂伦春北方狩猎第一乡，和各民族一起实现中国梦。

70年前，孤胆英雄李延培走进深山密林，晓以大义，动之以情，让人看到了他的胆识和勇气，也使鄂伦春人走下山，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过上了新生活。70年后，当年鄂伦春人的后代还经常和李延培的女儿保持联系，对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表示感谢和敬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自己的空军队伍时，李延培担任了辽宁东丰机场首任政委，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上世纪50年代，他又担任空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1974年12月，积劳成疾的李延培身患癌症，在北京空军总医院救治无效逝世，年仅56岁。他在39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屡建功勋，一身清风，留给家人的只有共和国为他授予的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他去世火化后，还在骨灰中取出了在身上留下的弹片。

我军为何能在最短时间内攻克坚固设防的天津——

城防图背后的故事

■徐宁

高度、厚度，都把它能够画出来，有这个，咱们打天津，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好打了。”天津战役时，王文源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市政工委书记，负责单线领导隐蔽在国民党市级机关内的地下党员。他接到获取敌城防图的任务后，找到隐蔽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工程处的麦璇琨，给他的任务是设法绘制一份全面反映全市城防工程的图，越全面越详细越好，并要画在一张图纸上以便于带到解放区。麦璇琨当时是“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段工程处工程师，即现场总工程师。

麦璇琨只掌握第八段的图纸资料和施工情况，要绘制一张全部城防工程图，谈何容易？好在麦璇琨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在一些工程段和有关科室中，许多人是他的同学，一提到工商学院，彼此都有种亲密感。他就利用这种关系，来搜集其它工程段的图纸。为了获取没有熟人的其它工程段的图纸，他就先设法取得上司的信任，对有的承包商偷工减料、建筑质量不合要求的工程，故意在监察工程质量时很认真。得到信任后，上司把许多重要任务都交给他去办，由他处理，这就为他搜集更多工程段的图纸提供了机会。

图纸和相关情况基本搜集齐全后，麦璇琨开始着手绘制城防图。城防图绘好

后，他把图交给了王文源。王文源找到他领导的隐蔽在天津市地政局登记处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铁铮，二人一起来到天津市西北角大伙巷街的大众照相馆，找到由刘铁铮单线领导的以照相馆经理做身份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康俊山。康俊山为缩印好这张珍贵的城防图，凭着自己多年来的技术，连夜将这张大张硫酸纸绘制的图纸分解成4块，各缩拍成8英寸照片，又经过化学处理，消除了表面的图像，裱糊在两张农村老年夫妇照片的后面。送到解放区查看时，只需先将裱在一起的图纸照片用清水浸泡，轻轻地将照片剥离，然后用显影液浸泡，图纸图像就可以清楚地再现。

康俊山的工作完成后，王文源又把照片送到在小刘庄以开设自行车修理铺作掩护的中共地下交通员赵岩手中，要他立即送往解放区。送两张农村夫妇的照片到解放区，尽管赵岩很是奇怪，但工作的特殊性告诉他绝对不能多嘴，他只知道要送的照片很重要。万一路上遇到敌人查问怎么办？赵岩事先编好了一段自圆其说的答语：“我是在天津做买卖的，老家在农村，照片上的老头和老婆婆都已经去世了，老家没有扩洗设备，我拿到天津放大了两张大相片，拿回家上供用。”赵岩一路奔波，虽然途中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土匪的拦劫，但都有惊无险，顺利将照片交给了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天津负责人杨英。

张克诚，1944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参加中共地下工作，是天津城防图的另外一名绘制者。天津解放前夕，张克诚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当工务员，即技术员。1948年8月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主持的加固增筑城防任务，由工务局工程处负责施工，竣工验收由工务局建筑科负责。当时，分配张克诚验收城防公路，因此他得到了城防公路图。但他不满足，想寻找一切机会搞到城防图。

1948年夏秋，张克诚向隐蔽在铁路局机务段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克明、郑梦鳌布置对铁路沿线及附近的城防碉堡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包括碉堡的位置、类型、距离、高度、厚度、射孔尺寸、形状等。

张克诚为了取得1948年下半年最新增补的天津城防图，可谓煞费苦心。张克诚早就摸清负责验收城防碉堡的常学诗工程师掌握有城防工事图，恰好常又坐在张克诚的办公桌对面，张克诚伺机寻找机会。1948年12月的一天，机会来了，局长派员叫走了正在看城防图的常学诗，常匆匆忙忙中将图纸放到书架上，张克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下班铃响了，常匆匆回来，忘记收图纸就回家了。等同事都走后，张克诚果断拿起图纸带回家中。

张克诚家住民族路27号一幢三层楼的房屋内。当时是1948年12月底，正值戒严期，严格实行灯光管制。巡逻

兵一旦看到哪家亮灯，就要进行搜查。为了不让灯光照射出去，张克诚将屋内的窗户拉上了窗帘，然后用图钉把一条夹被固定在木窗框上，通宵开始绘图。天亮了，图纸仅仅绘制了一半。怎么办？他想，第一肯定不能把图送回去，否则前功尽弃；第二不能不去上班，否则会引起怀疑。他再三权衡，决定冒险将原图留在家中，照常上班。

上班后，张克诚发现常学诗工程师到处翻找东西，便故意向常找什么，常支支吾吾地说不找什么，看到常不敢声张，张克诚就放心了。下班回家后，张克诚又忙了半个晚上，才将城防图全部描完。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悄悄把图纸放回书桌。常学诗上班后又来翻找，终于在书架上找到了图纸，赶紧悄悄锁起来。

张克诚提供的这份城防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包括了1948年下半年陈长捷增建的城防工事，因而是最新、最完整的城防图；二是标明了每种碉堡的设计兵员人数、火力配备、榴弹存放位置，为解放军攻城作战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参考数据。

据当年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工作过的乔兴北回忆，天津解放前，他们接到过好几份天津地下党送来的敌军城防图，他们将这些图集中汇总后形成一份准备的天津守敌城防图，攻打天津前夕，发给攻津部队连级以上干部每人一份。汇总后的城防图，如同破解天津国民党守军防线的“一把钥匙”，对我军实施精确射击，有效摧毁敌军重点目标，减少我军突击部队的火力阻力，同时减少炮火对民居、学校、工厂、医院、仓库以及水电等公共设施、设施设备的破坏，减少老百姓损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加快了天津解放的时间，也为我军较为完整地接收天津创造了有利条件。